明清宫廷史对比研讨会纪要

Summary of Seminar on Comparis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Court History

许冰彬整理

Organized by Xu Bingbi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明清宫廷史对比研讨会纪要

Summary of Seminar on Comparis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Court History

许冰彬整理　　Organized by Xu Bingbin

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为进一步推动明代宫廷史的研究，加强我院与社会各界学者的交流，扩大我院在国内和国际学界的影响力，由《故宫学刊》编辑部主办的“明代宫廷史对比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明史学会、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近 10 家科研和文博机构共 4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主持开幕式，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大清史研究基地主任杨念群、南开大学博物馆馆长刘毅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单霁翔院长鼓励将明清宫廷进行对比研究，他指出，通过对紫禁城同一个屋檐下两个民族融会贯通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对故宫六百年的宫廷历史文化。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30 余篇，两个会场 40 多位学者与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综合研究、文献和文物个案研究等多个角度，对明清两代代宫廷历史进行对比探讨，内容涉及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文化、图像器物、宫廷宗教、园林建筑、戏剧文学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对各类议题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文特将会议发言分类整理，以供读者评阅。

一　宫廷政治

宫廷政治的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的发言涉及明清两代宫廷政治的各个方面的对比研究。《故宫学刊》编辑部赵中男在《从后妃、亲王的不同作用看明清宫廷政治的差异》的发言中指出，清代的部分亲王不仅某一时期负责六部等机构的政务，清初和清末还以摄政王的身份代替皇帝理政，甚至还有部分军权，更突出了贵族政治的特点。明代则不同，成年的亲王一律离开京城到外地做藩王，称为“之国”或“就藩”，不参与宫中、朝中的任何政治活动，这种惯例被一再严格执行，逐渐形成了宗室亲王不干政的制度，同样是皇权政治发展、贵族政治削弱的标志之一。另外，明代外戚干政的情况也非常有限，不仅比前后时期大为减弱，并且即使是在皇位交接之际出面干预此事，也只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并不普遍，只有零星几个点，并没有形成一条可以贯通的线索。应该说，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防止后妃干政、防范外戚

家族势力染指朝政这点上，还是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而清代宫廷政治中贵族政治成分则较为浓厚，与皇权政治的冲突多于合作，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宫廷政治史更是如此；具有家族势力支持后妃干政的传统；宗室皇子作为一个特权集团，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这些情况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体现。从明清两代后妃、亲王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两代宫廷政治的差异，即明代具有官僚政治的传统，贵族政治的因素并不浓厚；而清代则具有贵族政治加民族统治的传统，官僚政治的传统则相对较弱。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末反政府势力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这个政权，而不是完全推翻这个制度；但清末的辛亥革命则不仅要推翻这个政权，并且还要推翻这个制度，这个变化固然包含了反对皇权专制的时代进步，不过同时也包含了反对贵族政治的某些因素。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肖立军在《明清宫廷决策程序比较——以章奏批阅之优先权为例》的发言中，将明清章奏批阅之优先权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明初中枢省还存在的时候，可以先看奏章，并对章奏进行筛选，甚至小事还有初步的处理权。第二个时期，朱元璋设立通政司，皇帝先看章奏。通政司的定位是门下省，主要任务之一是传达皇帝命令，史书中叫出纳王命，但是后来的史籍很少提通政司出纳王命，一般都提六科出纳王命。六科本来的三项职能分别是看详诸司奏本或者是奏启、朝会时当廷录旨、负责机密重事，与中枢省的权力互有牵制。这个转变有两点原因，一是洪武十二年前后，六科曾隶属于通政司，一是永乐时期皇帝父子关系比较微妙，六科有一个监督太子的因素。后来内阁出现，明代的章奏先交给通政司，通政司交给皇宫，皇帝可能看，也可能不看，然后内阁票拟，司礼监披红。第三个时期，清代提高了内阁的作用，通政司交内阁先看章奏然后票拟，皇帝批红再发回内阁，内阁由六科来参抄，消弱了宦官的作用。第四个时期，雍正时期，军机处设立以后，皇帝先看奏章，皇帝第一时间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可以交给军机大臣去议办，或者是由军机大臣按照皇帝的意思来处理奏折，皇帝有一些命令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州府。从四个时期的转变可以看出，皇帝中央集权日益加强，重视决策权，第一时间看到奏章、批阅奏章。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对明清各自具体的宫廷政治问题进行研究。吉林大学文学院李佳在提交的论文《洪武君臣关系的话语建构与历史书写》中指出，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以及交往过程中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构成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所形成的种种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言之，与元明易代，太祖制礼作乐，行封建，废相制等事关联颇深。梳理明初君臣关系生成所涉及的文化与制度话语，可见其重塑过程中的基调主要指向三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确认、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以及君尊臣卑相处模式的形成。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铺陈叙述，乃至于构建为一种被需要的“祖制”，深度参与了明代政治文化的塑造，寓意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现海在《“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与皇位世系转移》的发言中指出，“土木之变”后，原来受到王振集团压制的文官集团、宣德旧阁，协助郕王完成了清除王振余党的工作。而郕府旧僚仪铭、王竑在这一过程中，劝谏郕王顺应舆论，消灭王振余党，为获取皇权奠定基础。经历这一政治事件，明朝权力主体已发生了极大的转移与变化。孙太后虽然立英宗幼子为太子，尽量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宗一系，但经历清洗王振余党事件后，明朝政局已完全由郕王及其政治势力所控制，明朝皇位世系也由此最终

发生了转移。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刘盛在《青词与嘉靖政治》的发言中指出，明代嘉靖年间，由于嘉靖皇帝崇信道教，青词曾流行一时，并被认为曾对当时的政治发生过决定性影响。青词因而成为后世一种备受诟病的文体。细读青词相关史料，就会发现青词并不是一种具有原罪的文体，即使在明代，青词写作的优劣虽然在官员的升黜中会发挥作用，但这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刘盛认为，青词作为一种道教祈愿文体，并不天然地带有歌功颂德一类的政治色彩。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靖皇帝，虽然崇信道教，撰写青词的优劣无疑对大臣在嘉靖皇帝心中的形象具有重要影响。但究其实，这影响究竟有多大，还值得商榷。嘉靖皇帝虽然崇信道教，喜欢青词，对擅长青词的大臣奉赏有加，甚至加官进爵到滥用名器的程度。但若据此说嘉靖帝是一个庸主，完全依青词优劣决定大臣去留，则又不然。嘉靖帝虽然刚愎自用，喜听阿谀奉承之言。但对大臣能否尚非心中无数。自有自己认定的一套参谋系统。对于严嵩虽然宠信有加，但也非一味言听计从，重用的同时处处猜忌防范。青词只是道教众多文体中的一种，根据题材不同，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明代青词多为宫中应制之作，难免有内容空泛、词藻华丽、对仗工整等特点，这是题材的要求决定的，各朝皆然，不独明代为然。青词在明代大臣的荣枯中起着催化或润滑的作用，但绝非决定作用。

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杂志编辑部高寿仙在题为《南明永历初年一次夭折的改历事件》的发言中，主要探讨了南明永历宫廷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的不同态度。传教士与永历宫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肯定与接受，在宫廷内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据说永历皇帝的生母，两位太后还有皇后，还有一大批宦官都正式受洗，加入了天主教。因而传教士奏进新历，很快获准颁行。但是西洋新历未例行一年，就引起了另一部分士大夫激烈的抨击和批评，即使属于科学技术类的内容，往往也是遭到这些士大夫的排斥。因为历法是关系到宫廷政治的敏感问题，尤其受到关注。虽然宫廷里头的后妃、宦官大部分改信了天主教，但是控制永历朝廷的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不能允许这种颠覆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时龙在《论明代皇帝与阁臣的互动》的发言中，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票拟的过程，一是皇帝的传话以及传谕，甚至传贴，通过内阁是怎么传的。明朝皇帝处理政事，可以直接御批下发内阁的，通常不能改动，但是内阁大学士觉得有问题，可以跟文书房的文书官沟通，直接要求面圣，跟皇帝再商量。票拟是需要内阁先提出意见，分两种情况，一是发下章奏没有任何的指示，一是发下章奏但是让文书官以口谕的方式传说了，对于这两种情况内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对于直接发下没有旨意的章奏，内阁可以不票，或是根据经验和众大臣商议结果进行票拟，或是不清楚皇帝的心思，不敢票拟也可以奉还。内阁大学士如果不同意皇帝意见的情况下，往往会有五种的方式进行处理:其一，书返回，仍然不票；其二，拒绝肮脏旨意票拟，而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票，首辅大学士这样做的很多；其三，不完全抵制，但是打点折扣；其四，采取双票，按皇帝的意思拟一种票，但是顾及外面的舆论，另外再拟一张票，这是很滑头的做法，常招人非议；其五，根据皇帝的意思拟票，但是据理力争，比如要救这个人，后来皇帝为避免麻烦，在后面直接加一句不许生救了。皇帝对内阁的票拟也有三种态度：其一，同意，直接批红；其二，不同意，发给内阁改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仍然可能送还原票，还是不改；其三，不同意票拟，直接用红笔在上头抹了。此外，内阁是喉舌之司，作为皇帝的代言，也有三种情况：其一，上传下达，已批红的章奏发到内

阁之后，要迅速发出；其二，对皇帝口头的咨询做出回应；其三，为皇帝起草御贴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董建中在《雍正继位几个问题的再探讨》的发言中，从康熙皇帝遗诏、隆科多与皇帝授受关系以及《大义觉迷录》的出台等几个方面回顾前人的研究，提出一己之见。董建中通过详细的论证，支持了雍正合法继位说。

二　宫廷典制

关于宫廷典制的研究，本次研讨会主要关注了宫廷礼制和法制相关问题。南开大学常建华在提交的《明洪武时期宫廷的正旦节庆》论文中，重点探讨了明朝的贺正与正旦礼仪的发展过程。文中指出，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含有正旦礼仪，正旦朝会制度基本确立。洪武二十六年命礼官重定朝贺传制等仪，包含正旦朝仪，《明会典》朝贺仪即是以此为基点的。正旦节日前后还有享太庙、祭祀天地于南郊等其他的活动。洪武时期贺正朝会上的外国使臣，主要是高丽、琉球、暹罗三国，表达了对明朝统治与东亚影响力的认同。地方官、土司以及边夷进贺正旦表笺，表达了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权的统治的认同，体现“大一统文明之治”。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胡凡在《明代神乐观创置初探》的发言中指出，祭祀是儒家礼仪的主要部分。明朝创立之初，朱元璋便十分重视礼制建设，洪武初年改太乐署为神乐观。神乐观既是负责国家祭祀的机构，又是作为其办公地的天坛五大建筑之一。明代神乐观的存在既是明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明以前祭祀活动的继承与发展。明代神乐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乐机构，以道士为乐舞生，负责儒家的祭祀活动，很有特点，因此有必要对明朝神乐观进行研究。胡凡指出，神乐观的建立是顺应国家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不仅是供乐舞生生活演习的建筑群体，同时也是隶属于太常寺下的祭祀礼乐机构。我们之所以说神乐观是创建，其一，以前历朝祭祀机构都不曾以“神乐观”命名；其二，历代负责具体祭祀礼乐机构多以乐工或由良民中选取，只有明朝从道士中选任。这也反映出，明代道教已经渗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在国家祭祀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林乾在《清代宫廷管理法制化论纲》的大会发言中，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根据乾隆时期编纂的《国朝宫史》，清朝与明朝宫廷的范围有很大的不同，满族的文化风俗、民族习惯等，让其宫廷范围扩展到三山五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其二，清代宫廷法律非常严密，如《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的各种处罚规定非常详尽，有法可依。其三，清代圣德清明，相比明代帝王更加勤政，《大清会典》有很多与宫廷相关的内容。其四，清代宫廷也是一个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社会。对于最底层的太监，也有非常详细的法律约束，适用于贱民法。总的来说，清代宫廷的法制较完善，管理也较为成功。

三　宫廷建筑

宫廷建筑是宫廷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学者们进行明清宫廷史对比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李燮平在《明清外朝与内廷》的发言中指出，紫禁城由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组成，外朝以三大殿为主，

文华殿和武英殿为两翼，内廷以后三宫为主，东西六宫为两翼，另外还有外东路和外西路等宫殿。这里的外朝其实是一个狭义的表述，广义的外朝还包括大清门，也就是明代的大明门，清代的大清门到午门一线，这一点明清两代是一样的，但是明清两代的不同或者说清代的变化，主要是在狭义的外朝和内廷上。明代常朝在奉天门，上朝的时候，百官走掖门，不走中间两边的王门，清代后来简化了，平常掖门不开，大朝的时候才开掖门。清代改在乾清门听政，明代的乾清门不是奉特旨的话，外官不能进入，所以就没有朝所功能。明代左右两个顺门，除了午朝和晚朝，还有区分内廷和外朝的重要功能。明代的奏章，所谓外由通政司，内有左顺门为转述。由于清代改在乾清门听政，所以从武英殿一直往北到造办处，东侧是从文华殿一直到箭亭，都划为外朝范围了，比明代有所扩大。明代的常朝反映的是紫禁城的原始规划，清代的御门听政实际上反映的是紫禁城宫殿制度和政治变化的关系，特别清代还设立了南书房、上书房，各有行走，还有乾清门行走等等职务的官员，直接辅佐皇帝。另外通过内务府替代了明代的宦官二十四监，避免了太监干政，这也是明清两代最大的区别。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陶金在《明世宗明堂式道教建筑初探——“神王”追求的物质载体》的发言中指出，明世宗以明堂的名义修建天坛大享殿，作为“大礼议”中使生父祔庙的条件之一。此后，他又以大享殿的形制设计建造了大高玄殿乾元阁、西苑崇智殿、大光明殿等一系列道教建筑。明世宗将明堂这一儒家礼仪体系中的祭天建筑形式嫁接到道教对玉皇的祭祀中，并借此开始了自身形象重塑。文章指出，明堂式道教建筑在嘉靖年间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世宗重建明堂的最初目的是用于对天的祭祀，并借此提升自身皇位的合法性。随着其兴趣转向崇道，明堂建筑形制被用于道教建筑，国家祭典的荣耀与合法性被转移给道教祭祀。伴随着这一转移，明世宗完成了自身“亦神亦王”的形象重塑，他从一个费力为自己与双亲苦苦争取地位的少年君主，蜕变为拥有华丽尊号的真人帝君。遍布宫禁内外的明堂式道教建筑，成为世宗“裁理天下”的新舞台。远儒士近道士、弃朝政迷玄修，是明世宗在当时和后世遭到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但客观来看，执政方面，世宗辍朝而不懒政，穆宗即位时的明帝国远比世宗即位时强盛与稳定；价值观方面，世宗看似抬升了道教的地位，而事实上是以儒学的价值观将其进行了改造，继宋代真、徽二宗后再一次强化了对代表至上皇权的玉皇大帝的崇拜，进一步弱化了道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性。世宗崩后，宫廷道教一蹶不振，民间道教也因过分强调神明崇拜和科仪法术，愈加削弱了对核心文化与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但以明堂为原型、以道教为目标、以理学价值观为潜台词创造的明堂式道教建筑，影响了后世中国诸多宗教的敬天（天神）坛庙，甚至成为中国民众最熟悉的祭天符号。文章从明世宗个人经历、信仰实践、君臣关系和执政理念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史志文献、道教经典和建筑图像等多方面材料，揭示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内涵，揭示其作为明世宗“神王”追求之物质载体的本质。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龙在《颐和园德和园设计过程分析》的发言中指出，德和园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内，仁寿殿北侧，是光绪朝重修颐和园时为满足慈禧太后观戏和举行庆典活动而新建的重要建筑群。通过对传世八件德和园样式雷图档（包括画样六幅，烫样一件，做法册一份），圆明园同乐园相关样式雷图档，德和园现状及其隐蔽部位信息的综合分析，可清晰地看出德和园的设计经历了如下过程：(1) 大戏台及扮戏楼平面由“一”字形改为“十”字形；(2) 看戏楼、看戏廊照搬同乐园设计，按院落尺度等比放大；(3) 五间看戏

楼改为七间看戏殿，通面宽增大，总高降低；(4）看戏殿两边撤去净房，穿堂调整至中间一间；(5）建成后庆善堂两侧由游廊改为敞厅，颐乐殿东西穿堂接修前廊。设计变化的过程透露出该建筑群设计时所考虑的主要内容：(1）看戏殿、扮戏楼变宽以匹配院落尺度，加强对空间的控制；(2）大戏台连台戏、庆典戏的表演有更多的演员和更大的切末，扮戏楼需要更多的空间；(3）解决帝后、大臣、演员和太监宫女等不同等级人员不同的进出流线，使之更为流畅；(4）调整看戏殿高度来突显演出空间的院落核心地位；(5）建筑体量与周边建筑呼应。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田园在《明清两代紫禁城的花园》的发言中指出，明清两代在紫禁城中共建有四座花园，即明代的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和清代的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分别从建园目的、建园手法将明代和清代建造的花园进行对比，比较明清两代帝王对于紫禁城花园的构建历史和实践，探索明清两代紫禁城花园的不同的风格、布局和形制以及所反映的花园的设计者明清皇帝的不同人文思想。

四　宫廷机构

南开大学杜家骥在提交的《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一文中，主要从明清宫廷侍奉机构及人员；宫廷造办、纂修、教育机构；宫廷守卫机构及人员；宫廷行政机构及官员等多方面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并分析了明清宫廷这些差异的原因。杜家骥认为，明清宫廷最明显差异之处为供职于皇宫中的人员，明代主要是太监宦寺，而清代太监大量减少，供职较多的，是内务府旗人包衣（奴仆）男妇，旗人（主要是上三旗人）官兵、杂役、匠人等，还有蒙藏喇嘛、汉人及西洋人，在“男女之防”上，对外部男性入宫的禁限，不像明代那样森严。而且清代由于宫廷护卫机构及官兵内移至紫禁城中，宫中又增设造办处、纂修出版机构、官学及诸多行政机构，因而日常入宫之人远较明代为多。由于皇帝勤政，每日都有内廷行走者、召见奏事者与皇帝办理政务。满汉官员也每日频繁出入皇宫，甚至接近或深入到后宫区，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另外，清宫中还设置与满族骑射有关的机构。满族入主中原，清室入居明宫，为清代宫廷带来诸多特色，既有满族旧俗，又有对明代宫廷弊政的剔除，对清代政治也产生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林欢在《明代御用监的机构与工匠初探——以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运作角度出发》的发言中，比照清代乾隆时期内务府造办处的基本情况，着重从明代御用监的形成、沿革、机构设置；职权变化，采买（包括“取办”、“岁征”）、“造办”；御用监内主要宦官的构成及其职衔、特权；宦官与皇帝的关系；工匠的来源、数量变化、待遇与晋升；御用监对于武英殿画工的管理；御用监在明代宫廷文化中的实际地位等方面，从个案分析上对御用监进行梳理，进而分析明代御用监运作的具体状况，并对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或提法试做考辨。作这样的资料考索，意在为明清宫廷器物制作工艺的演变发展趋势、明清两代宫廷文化的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实例。林欢指出，以清代某一朝代的造办处运行情况对比整个明代御用监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况且由于文物收集的局限性缘故，尚不能对两百多年来明代宫廷工艺文物的全部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而且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些现存的文物基本属于饱经数百年动乱的劫余品，故而与整体明代宫廷工艺文物的全貌差异甚大。

故宫科研处沈欣在《内务府景山官学设置运行考述》的发言中指出，清朝统治集团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培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管理人员，必须加强统治阶层的文化素质教育。康熙二十五年正式建立的景山官学，是内务府下设专门教育内三旗包衣子弟的学校。在两百多年的运转中，景山官学的设置和运行逐渐完备化、制度化，其建立发展的过程与清代各朝文教、吏治和皇室运行密切相关。沈欣主要阐述了景山官学的建立缘起与落实、人员设置、学房设施与管理制度，教习和学生的拣选来源，教学内容与考试，运行中产生的积弊和整顿情况等相关问题。通过细致论证，可以看出景山官学作为清廷第一个教育内务府三旗包衣子弟的学校，在清代宫廷乃至清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不容忽视，是整个清代文教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宫廷宗教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在提交的《孝定李太后与晚明佛教的复兴》论文中指出，明朝中期，佛教衰微。隆庆、万历年间，最高统治者提倡佛教。尤其是孝定李太后，不仅宣扬自己是九莲菩萨、观音菩萨，而且狂热地崇奉佛教。她极力提倡佛教，大肆修建寺院，礼敬僧人，大量赏赐布施，礼请僧人在京师及各地举办法会，传戒说法，编辑刊刻《续入藏经》，颁赐各地寺院。特别是对云栖袾宏、达观真可、憨山德清晚明三大师，孝定李太后崇礼皈依。但是，德清、真可因“国本”而得罪神宗，下狱谪戍、去世，李太后不能救护。李太后狂热地崇奉并提倡佛教，在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崇佛风气，促进了晚明佛教的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曹根华在《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会面再考》的发言中指出，关于达天通理和六世班禅的会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乾隆时期汉藏佛教领袖的一次会面，很多学者已经有一些研究，但是在材料的使用上，第一手资料的占有率还是不够，考证还不是特别的详细，有必要再一次做一个梳理。曹根华采用了第一手资料，藏文的《章嘉国师》以及最新发现的一些汉藏佛教的资料，重新梳理了这次会面的情节，包括会面的缘由、时间、地点，以及会面时具体的人物、交谈的内容等细节问题。经过考证，会面的源起是六世班禅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就提出一个宗教界的交流申请，然后由章嘉国师翻译，开始联系相关的官员，而达天通理跟乾隆皇帝的关系也很好，同时他又是清代汉传佛教的一个领袖，因此双方的这次见面，基本上是约定好的，不是无缘无故就可以马上见面的。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是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四日至九日之间某一天的万寿寺。因为这是一次半官方半私密化的会见，通过梳理各种资料，会谈的内容主要涉及佛教的戒律，还有关于汉藏两文翻译的问题。

六　宫廷文物

文物与文献相结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宫廷史研究尤其重要。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宫廷文物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绘画、瓷器、武备等方面，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以来，对明清两代帝王行乐图之研究方兴未艾，颇为可观。现存明清帝王行乐图为数不少，尤其是盛清时期的雍正与乾隆二位皇帝；明代则有宣宗、宪宗等所留的行乐图。来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学系吴美凤在《帝王行乐万千般——

明清帝王“行乐图”比较》的大会发言中，通过初步整理历来专家学者所做的行乐图研究，从两朝帝王行乐图中呈现于构图、技法、用笔、设色等风貌，乃至画中主题、人物，器用、陈设等诸面相进行比较，阐述了明清帝王行乐图的异同。吴美凤指出，明清两代的行乐图都有被征服者的痕迹，比如《明宣宗行乐图》中的穿戴都是元朝蒙古人的服饰，而清代的帝王行乐图几乎都是穿着明朝的服饰。从画法上讲，清代东西方技法并存，而明代大部分是用传统人物画的画法，就是用线条勾勒，然后再用颜色拼图。清代受西方的影响，开始有一些焦点透视的画法，有远近效果，人物的脸部有明暗的光影，没有明显的线条勾勒。清代帝王行乐图比较喜欢用蓝色，这在明代的帝王行乐图里很少看到。从内容上看，明代的帝王看起来是“众乐乐”，清代的帝王有点“独乐乐”。两代的行乐图中除了骑射、行猎主题相同以外，明代的宪宗元宵行乐图，内容为民间都可以看到的游戏，有与民同乐的感觉。此外，清代《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周围的陈设中出现了圆桌，这种圆桌在明代的行乐图里面就没有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根据天圆地方来衍变的，这种陈设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沈阳故宫博物院李理在大会发言的题目是《清朝在武器装备方面对明朝的一个继承》，发言主要涉及两个内容，一是清早期对明朝的冷兵器和热兵器直接继承，二是清朝在武器装备上对明朝的继承和发扬。李理列举了许多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如明朝宫廷直接赏赐努尔哈赤的御用宝剑、皇太极的御用腰刀，甲胄、头盔、马牌等，从制作工艺和配饰上比较，都能看出明清之间的传承关系。还有火器，如清朝的火炮、火铳等，体现了对明朝武器装备的继承和创新。清朝还将一些在明朝宫廷里面使用的常见器物，演化成了一种军事上的设施，比如宗教活动中的云板，变为一种报警的工具。这些器物上的演化和提升，实际反映了明朝文物的一些特征，也就是中原文化的特征，可以看出满族对优秀文化的一种学习、吸收、借鉴和发展的过程。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孙悦在《清代宫廷的古瓷收藏》的发言中，主要以清代宫廷收藏的历代古瓷为考察对象，依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贡档》等档案材料和故宫博物院瓷器库存，统计清代入藏宫廷的古瓷，即明代以前（含明代）的陶瓷器物，由此窥见当时清宫藏瓷的概况。通过分析这些瓷器的数量、品类、时代，了解这些瓷器的来源和用途，可以得知清代宫廷阶层对于瓷器类文物的审美品位和鉴藏标准，亦可由此分析其对于后世瓷器生产、收藏所产生的价值和影响。

七　宫廷戏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真瑜提交的《清宫对明代宫廷戏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论文中指出，清宫对明代宫廷戏剧文化的传承是明显的，并在传承中有所发展。在制度方面，清宫在承袭明制的同时，逐步将多家掌乐机构合而为一，具有集中管理的优势，可谓是体制上的一个进步；在承应人员和剧目编创等方面，清宫在沿袭明朝做法的基础上也有新的特点，“内学”和“外学”共同承应宫廷剧乐，以及清统治者在剧创方面较强的参与意识等，都是其在宫廷戏剧文化上的发展所在。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掌乐机构：从明宫教坊司等到清宫升平署，二、承应人员：从明宫近侍承应到清宫内廷供奉，三、剧目编创：从明宫“本朝

教坊编演”本到清宫“内廷四大戏”。李真瑜认为，清宫在宫廷掌乐机构、承应人员、剧目编创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延续了明代宫廷戏剧文化的程式与内容，并在传承中有所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王永恩在《明清宫廷戏曲管理之比较》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明清两代对于宫廷戏曲的管理不尽相同。从管理体制上看，明代的宫廷戏曲管理有内廷与外廷之分，这两种功能分别由钟鼓司和教坊司承担。钟鼓司是为皇帝服务的，而教坊司是隶属于礼部的，是为朝廷服务的，其功能大不一样。万历时期，设立了玉熙宫，以习外戏，玉熙宫没有按常规那样隶属于钟鼓司，而是隶属于教坊司。从此，宫廷演剧主要由教坊司管理。入清以后，钟鼓司日渐变成了分管礼仪乐舞的机构，不再管理戏曲演出了。从康熙朝起，宫廷中的戏曲演出活动日盛，在教坊司之外还出现了南府和景山两个管理戏曲的机构，并且从康熙中期开始就承担起了宫廷戏曲的教授、排练和演出任务。乾隆七年，为了加强对宫廷礼乐的管理，特专设乐部，将原太常寺所属之神乐观、礼部所属之和声署、内务府掌仪司所属之中和乐处、銮舆卫所属之卤簿乐队、侍卫处所属之什帮处等机构，统由乐部管理，但南府仍然保留，以便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事务，同时南府还兼管部分内廷音乐的承应工作。乾隆时期的戏曲活动最为频繁，南府管辖的相关人员数量庞大。嘉庆朝南府、景山的人员大大减少。道光时期，对戏曲管理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清退了许多人员，二是景山大小班都归并南府。道光七年改南府为升平署。光绪时期，由于慈禧太后酷爱看戏，迎来了清代宫廷戏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由于升平署的演出规模和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内廷还专门成立了以慈禧太后长春宫太监为主的戏班，他们向教习学习排练外间剧本，不向升平署支钱粮，戏目则由升平署分派。同时，还常把外班招进宫内演出。通过详细对比，王永恩认为明代宫廷无论是演出规模还是演出次数都无法和清代相比，它的演出管理机构的职能也相对较为单一。而清代宫廷的演出管理机构则多次变迁，管辖范围不断发生变化，统治者对戏曲的喜好程度极大地左右了戏曲演出管理机构的功能。

北京外国语大学梁燕在《西太后与“内廷供奉”——以齐如山的〈谈四脚〉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京剧理论家齐如山（1877 ～ 1962 年）在他所著的《清代皮簧名脚简述》、《谈四脚》书中，多处提到慈禧太后时代梨园界名伶进宫演戏的情形，这些名伶都是擅长皮簧戏的各路好角，进宫承差主要是为满足慈禧太后宫廷娱乐的需求。像杨隆寿、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王瑶卿等，都有一个响亮的头衔，叫做“内廷供奉”。然后梁燕详细阐述了“内廷供奉”的由来和慈禧太后对皮簧戏的推崇、“内廷供奉”的特殊才能和特殊荣耀以及“内廷供奉”的卑微地位和风险意识等相关问题。根据齐如山的有关著述，慈禧太后时代的“内廷供奉”是以出色的皮簧技艺侍奉皇家娱乐的当红艺人，他们的宠辱取决于帝后的好恶，个中的风光与悲酸况味，可谓冷暖自知。齐如山遍访梨园界几千人，从多位有着“内廷供奉”身份的老辈艺人口中采集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有助于后人了解和研究清宫帝后观剧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审美习惯对京剧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张振清在《论清宫大戏〈昇平宝筏〉的成熟时间及版本流变》的发言中指出，根据北京大学发现的《昇平宝筏》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在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其祖本就已经出现了。《昇平宝筏》的流变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古本系列时期，在清宫档案中遗存下来的一些西游戏曲；二是一些民间的俗曲和杂剧，被文人整理以后进入到了宫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京大学发现的这个版本，也可称为岳小琴本；三是古本戏曲总刊，四是现在遗存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四色精抄本，日本著名学者吉布张先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

两个版本谁在前谁在后，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从剧本的题目上来看，在康熙朝的《昇平宝筏》题目中，主要就是六七八字、九字，到了乾嘉时期就出现了七字本，然后又出现了四字本，到了道光朝，全都是四字本了。根据戏曲一般演变的格局，七字本一般在四字本之前，最后从四字本变成了道光朝的节本，也叫做二十一段本，整个格局都缩小了。

八　宫廷文学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陈圣争在《乾隆帝文学与文化政策在清代文学史、批评史中当不容忽视》的发言中，通过梳理乾隆帝文学及文化政策研究的现状，从主客观上概括为“两个遮蔽”、“两个偏见”，以揭示出学界对于其文学及文化政策研究长期踯躅不前的原因所在。两个遮蔽是指:被时代环境与文化思潮所遮蔽;被历史研究与大众文化所遮蔽。而两个偏见是指：乾隆帝御制诗文中存在代笔之作；大多诗歌水准不高，且多陈词滥调。此外，乾隆帝的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尤其是乾隆朝的科举改革——科举考试中加入“试律诗”——这一举措不仅对社会上大兴学诗的风气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随着政策的逐步调整，对于当时社会上的“宗唐宗宋”或由唐趋宋等诗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试律诗的诗题得句、考官批语，代表着国家层面对诗歌的要求，因而全面考量它们的规律及变化，亦可透露出一代诗风变化与转移的消息。如纪昀、翁方纲、王芑孙、法式善这些试律诗名家在当时更是引领风潮，他们对试律诗的见解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个人的诗学取向，这又对乾嘉时期相关人物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乾隆时代诗学昌盛，与乾隆帝的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有着莫大关系。传统诗教虽然产生年代久远，但响应这种观念的代不乏人，在乾隆时代更是形成一种有意识地主动接受的潮流，乾隆帝因势利导，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不容忽视。陈圣争在在总体概括地考察乾隆帝的诗文、诗学思想、科举考试等内容后，认为此前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缺失帝王这一环节是一大缺憾，至少乾隆帝的文学态度、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很重要，它应当成为中国文论史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乾隆帝也应当是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慧倩在《北京回族民间传说中的明清帝王意象》的发言中指出，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王朝的都城，宫廷和皇帝与北京民间社会之间的距离很近。北京回族的民间传说中，屡次出现明清皇帝的形象。丁慧倩主要考察了纱灯爸爸的故事和乾隆微服私访的故事，分析民间传说的内容、结构以及皇帝的形象和皇帝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对民间故事的分析，阐述了北京回族与明清两代朝廷的复杂关系。

九　宫廷典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兆裕在提交的论文《明清典籍中的皇城及所反映的问题》中指出，皇城是帝王生活和工作的所在，也是宫廷政治赖以发生的重要地点。但明清两朝对皇城的记载却有很大区别，反映出两朝官方和社会的不同心态。明代官方对皇城内的宫殿及其位置的完整披露，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民间也无这样

的记载。总之，明朝人对本朝的“心脏”的记录是零散和相对模糊的。明末《酌中志》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空白和缺憾，但这部书并不是专门为此而作，直到《明宫史》将《酌中志》的相关内容辑出，才使记录明朝皇城有了专门之书，但这已经是易代之际的事情了。清代尽管《一统志》中也说“自干乾清门以内殿廷之制度，中禁严密，不敢详载”，但较之明代已有很大不同，不仅《清会典》内有记录，还有《国朝宫史》这样的官修专书，同时，在《日下旧闻考》中，还大量增加宫殿门亭的内容。因此，清代所展示的皇城内的建筑情况，远比明代要完整和详细。文章通过史料的梳理，详细对比这种差别，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李士娟在《清宫遗存明代医籍考》的发言中指出，宫廷古医籍的存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府政策、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学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健康状况，亦是宫廷史的组成部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明代中医药典籍数十种，且流传有序。从内容上涵盖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本草、临床等各科。以临床各科为例，所涉及有内、外、妇、儿等诸科。从版本种类上以刻本为主，从刊刻机构上分有内府刻本以及各地方医药机构刊刻本。李士娟以清宫存藏明代医籍为依据，从中医内容的实质即科别、用途的侧重而不同，分析阐述故宫图书馆收藏古医籍情况，探讨了宫廷收藏明代刊刻古医籍之特色、价值及意义。最后她指出，清宫遗存的明代医籍传承有绪，具有显著的宫廷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医学衍变的过程，对保存和整理研究继承中国医学传统文化，以及临床医学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学术价值。李士娟在发言中披露了《新刊重信新方》、《脏腑治症图说》、《保婴全书》等新发现的四部明代孤本古籍的详细内容，引起了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在《满文及满文文献》的发言中强调，就研究满学和清史而言，学习满文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清一代它是国语，因而留下大量满文文献。赵令志首先介绍了满文创制与改进，接着分析了满文作为国文的作用，清代颁布许多典政朝纲的政书以及敕书、条约等，都要用满文。最后重点阐述了满文文献的分类与重要研究价值，满文文献大体可分为书籍、档案、舆图、谱牒、碑刻、匾额、木牌、钱币等类的文献，其中档案量最大，书籍次之，其余存量比较小，在研究清史、民族史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曹刚华在《清代官方视野中的清代佛教史籍》一文中，主要通过《故宫所藏殿本书目》、《秘殿珠林》、《四库全书总目》、《钦定盘山志》、《钦定清凉山志》等清代官修文献的梳理，对清代皇家与地方官府编撰、刊刻、著录的清代佛教史书进行较系统的考察。曹刚华认为，清代官方之所以有编修、刊刻、著录清代佛教史书的活动，其原因或出于康熙、雍正、乾隆帝的个人喜好，或出于历代官方书目著录体系对于有资考证佛书著录的传统所致。

十　碑文铭刻

故宫博物院科研处王浩在《门头沟石厂村明代采石碑刻遗存考述》的发言中指出，明代北京城市建设、特别是皇家建筑所需的大量石材大多开采于北京周边，门头沟石厂村就是明代其中一处重要的青石石料开采地点。石厂村范围内遗存有三块与明代石料开采相关的碑刻，其中两块刻于嘉靖年间，另一块是万历年间石厂东栅栏过街楼的碑匾。王浩通过对这三块碑刻的考证，确定了门头沟明代石厂的范围以及开采大致的年代

等信息。此外，结合实地考察周边的一些碑刻材料、采石遗迹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勾勒出了门头沟石厂在明代的开采情况，为研究明代北京城市建设尤其是嘉靖朝一些皇家建筑兴造提供了重要碑刻材料。

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赵志强在《明清皇宫匾额之文字比较研究》的大会发言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两朝的异同。其一，匾额文字不同。明代就是汉文，到清代，多的时候有三种文字，即满文、汉文、蒙文，多数是满文和汉文。也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只是用一种文字就是汉字，比如说三友轩的匾额。其二，从文字的字体来看，明代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基本都是楷体字。清代字体比较丰富，除了楷体以外还有篆字。其三，从文字顺序来看，大部分是满文在左边，汉文在右边，这是背对匾额的角度。赵志强认为，明代的思想比较单一，文化也是一样的，虽然在明朝的治下也有很多的其他民族，但是各民族的问题并没有体现在皇宫这样比较高贵庄严的场所。清代除了本民族的满文化以外，还崇尚汉文化、蒙古文化。清代皇宫的匾额上也保留汉字，也体现了清代统治者的一种文化自信。

限于本文篇幅，本次研究会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不能一一详尽记述。与会学者们论文的选题非常宽泛，研究十分深入，在很多热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都有所突破，并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学术价值极高，极大地促进了明清代宫廷史对比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